致俄國議會經濟政策委員會
特別備忘錄

林登・拉魯旭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一，席勒學會的代表應邀參加了俄國議會（杜馬）經濟政策委員會主持的一系列圓桌討論會。

席勒學會的代表提出了實物經濟學的思想，同時扼要闡述了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爲討論會準備的特別備忘錄，并將之散發給全體與會者。

下面是拉氏備忘錄的全文。

在我看來，現今俄國、東歐以及整個前蘇聯的經濟局勢中的關鍵問題按其戰略重要性而言可以歸納如下：

甲、俄國陷入了新的一輪世界貨幣金融崩潰之中而無法自拔。

甲一、最近以來，當今的全球貨幣金融秩序陷入了新的一輪危機之中，其明顯的標志是：(1)、債卷市場長期持續滑落，(2)、由于「共同基金垃圾債卷」等的投機活動引起危機浪潮，如墨西哥的危機，(3)、南美、意大利和東歐一些前經互會國家潛在的類似危機。〔有人歇斯底里地否認這一事實，但是正好與他們的這種徒勞相反，當前這種政府和私人機構陷于破產或瀕臨破產的情況不是一個孤立和局部的問題。局部危機的不斷增加正好說明這是一場流行病的結果，是全球金融貨幣體系全面混亂的結果。〕

甲二、導致俄國及其鄰近國家當前的經濟危機的原因，是世界貨幣金融體系不斷發生的危機與俄國基本無力滿足西方金融勢力的掠奪需求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基本枯竭的俄國經濟的不斷萎縮，是壓在以倫敦爲中心的世界金融市場頭上的沉重壓力。這一壓力反過來又起到這樣一種作用：由于西方金融體系無力提供足夠的援助來維持現有的俄國改革進程，這一所謂的俄國改革也被送進停尸房。

甲三、由于這些原因，無論是對俄國還是對世界來說，只要按照當今主要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原先的條件，那麼，要解決這場危機是不可能的。現有的世界體系來源于一九七一年後的「浮動匯率制」國際貨幣體系，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相關的「條件限制」一樣，必將在近期或中期徹底覆滅。要麼是通過有責任感的政府對現存中央銀行和金融體系進行國家控制的破產重組來讓現有體系有序地壽終正寢，要麼是聽任世界金融體系這個投機金融肥皂泡的「熱核」爆炸所帶來的連鎖反應把現有體系粉碎。

甲四、解決這一總危機的任何可行方案都要求各國政府負起責任來，建立新的貨幣金融體系，并以之來取代現在仍在控制世界但確瀕臨破產的體系。

甲五、俄國問題的特殊性在于，西歐、北美、日本、還有中國在近期和中期都還有一定雖說在不斷縮小的回旋余地，而俄國和其它許多國家一樣，在現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下生存的余地已經蕩然無存。

乙、俄國現在局勢的戰略特點

要治病，我們必須找到病根。要治療俄國經濟今天的沉痾，我們必須準確地找到病因。

有人說，俄國經濟的病因是俄國未能適應成功的西方市場經濟原則。這也許可以使我們想到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患了感冒的人找醫生看病。他吃了醫生開的藥，但感冒卻轉成了肺炎。這時醫生告訴他必須加大劑量，這人照著醫生的話做，但卻醫治無效而夭亡。他家人邀請醫生參加

葬禮，但醫生卻没空，因爲醫生吃了同樣的藥，正在他自己的葬禮上呢。

這就是俄國在西方「醫生」的所謂奇跡治療下的經歷。這也是前經互會國家接受過的杰夫里·薩克斯（Sachs）教授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所謂「波蘭模式」的致命藥。到一九八九年，埃夫根尼·普雷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y）曾經說過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使所有經互會國家的經濟病發展爲尖銳的政治危機。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撒切爾夫人和喬治·布什的「蒙特佩樂林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式的市場經濟「藥」幾乎將人送命。如果我們看看世界上的各國經濟和市場，我們會發現：外國，即所謂「自由貿易經濟」魔術師們，由于吃了自己的藥而自身難保。如果我們知道陷于危機的西方經濟需要哪種經濟政策來抵御這些致命藥的藥效，那麼這也是俄國需要的政策。也許我們和那些倫敦紐約的妖怪一樣，都是同一世界流行病的受害者，遭殃于一九七一至一九九五年間不受管制的後工業化烏托邦模式。

因此：

乙一、要找到當前俄國經濟危機的根源和解決方法，我們必須開始認識到，如果看不到過去十年間前蘇聯和俄國的經濟崩潰是整個世界經濟崩潰鏈條中特殊的一環，那麼，我們就不能眞正認清問題。

乙二、如果我們不能看到另外一個因素，即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五年間加劇俄國危機的最嚴重事件正是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其反歐性俄國政策的首要同盟者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公開宣布的仇視政策的結果，那麼，我們也不能認清俄國危機和找到解決方法。

乙三、在一九八九年的最後三個月里，在如何對待前經互會國家問題上西歐出現了兩種相互對立的政策。一種是由荷蘭銀行總裁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Herrhausen）和席勒學會分別提出的建議，即由東西方合作在前經互會國家中大規模發展基礎設施。這些政策反映了法國外交部長蓋布里爾·漢諾陶（Hanotaux）和俄國伯爵塞爾吉爾·維特（Witte）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思想。在這三個月中，這一政策遭到英國皇家出于「政治原因」的強烈反對。一九八九年底，撒切爾夫人的政府發表了最強烈的聲明，堅決反對前經互會國家與德國合作開展任何大規模的經濟發展計劃。喬治·布什總統對這一政策和她的其它類似政策以及後來約翰·梅杰政府的政策表示支持。

乙二二、撒切爾－布什對前經互會國家的政策是「殺光燒光」政策。這一政策最好可以說成是一種地緣政治幾何命題；在這里，其前提與一九四五年在被佔領德國實施的「摩根索計劃」的前提一樣，即哈爾弗特·麥金德（Mackinder）的箴言。一九八九年底和一九九零年，在布什和其他美國和聯合國的貨幣主義分子的支持下，倫敦提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薩克斯的「震蕩療法」，先是在波蘭實施，然後又推廣到前經互會各國，迫使當時存在的工農業生產能力大規模破產。

乙二三、伴隨「震蕩療法」而來的是全面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前經互會國家各種大量的國有資產以不可思議的低價在國際市場上傾銷，換來的是少量存入俄國和其他投機分子賬戶的外匯，因爲正是這些投機分子在世界市場上出賣了波蘭、俄國和烏克蘭及有價值的資產。這一英國式掠奪政策的動機，不僅是要通過這種對前經互會國家的殖民主義式掠奪來補助日落西山的西方經濟，而且也是想通過「地緣政治」來削弱歐亞「腹地」的經濟，從而爲倫敦的寡頭集團增強以所謂「環太平洋」爲基礎的霸權地位。

乙三、一九九四年中期以後，俄國的經濟有可能出現轉機，原因是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一九九四年七月那布勒斯八國高峰會議上和在波恩柏林采取行動，宣布與德國建立一種新的「特殊關系」，結束與英國的「特殊關系」。美國總統的行動表明，美國與德國的新「特殊關系」的主要作用是爲與柏林以東歐洲國家的經濟合作開發一條生命線。雖然這些都是向好的方向轉變，但是俄國從這些政策變化上所得到的東西迄今爲止還只是可能性，而不是實際效益。

乙三一、這些變化的實際意義主要是以下幾點。克林頓總統打破了美國在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間執行的撒切爾夫人和布什先生鐘愛的地緣政治政策，這也就是英國皇族及其爪牙如喬治·布什、法西斯新保守主義者和美國國內主要傳媒對克林頓總統大肆攻擊的主要原因。克林頓總

統和科爾總理不顧英國的拼死反對，采取重要的步驟推行歐亞基礎設施合作的某些內容，而這些都是席勒學會在一九九〇年提出的「生產三角區」草案和以後的「德羅斯計劃」的建議。雖然德羅斯計劃還僅限于一種倡議，但它是前經互會國家今後復蘇的重要和最有希望的部分。

乙三二、美國和德國之間的新「特殊關系」對波蘭、俄國和烏克蘭等國家來說是一極好的機會，因爲它給人一種希望：撒切爾和布什的地緣政治掠奪政策可能廢止。擬議中有俄國參與的鐵路走廊和其它發展計劃是俄國和鄰近國家恢復經濟的組成部分。不過，雖然這些發展計劃是恢復經濟的必要步驟，但是單靠它們自己并不能進到眞正的經濟復蘇。美德這些轉向東歐的政策變化雖然從決策方向來說是有益的，但它們沒有提到要扭轉全球崩潰而必不可少的關鍵任務：早就應該對從本質上說已經破產的現有全球霸權性貨幣金融秩序進行改組。

丙、計劃可以有所不同，但正確的原則不變

一旦承擔起在危機情況下制定經濟政策的責任，就必須區分正確的原則和與這些原則相符的各種政策。必須完全明白正確的原則和也許建立在這些原則基礎上的各種政策之間的區別。最能說明這種區別的概念就是形式演釋幾何中公理與命題的區別。

任何幾何教科書一方面要告訴我們一組公理和公設，另一方面又要告訴我們沒有止境的多個命題，它們有可能被證明與該組公理和公設相符。從一般的物理學講，尤其是從經濟學講，我們應該用「原則」這個詞來代表形式幾何中公理和公設的位置。可以證明與具體原則不相矛盾的具體政策，或「經濟規劃」，則相當于形式幾何中可以證明的命題。

〔請注意下面這一鮮爲人知的科學方法。在柏拉圖的著作中，表達形式系統中任何具體恆定的公理和公設的名詞是【假設】，即比如說柏納德・里曼（Riemann）在他一八五四年所作的資格論文中使用的意義。這是在歷史上對「假設」一詞唯一正確的使用，決不是亞里斯多德主義者、經驗主義者及其追隨者所使用的「假設」一詞。在柏拉圖和黎曼看來，新的【假設】代表一組經過改進的公理和公設，目的是讓數學來證明物質世界。〕

經濟學也和物理學一樣，每當我們面臨一個失敗的實驗時，我們都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是在實驗的設計或進行中的某個部分違反了確立的某個科學原則。第二種可能性是我們遇到這樣一種情況：某種普遍接受的科學原則失靈了。現有世界經濟危機就屬于第二種情況。事實告訴我們，根據世界上每一所名牌大學當前教授、同時也爲人們普遍接受的經濟學原則所做的政策選擇，完全可能是一個致命的錯誤。

在這一情況下，一國政府可能做的最大蠢事就是咨詢那些有名的經濟學專家，比如問他們：「我們應該怎樣來糾正我們的錯誤？」無論這些正統經濟學家（不管他們是「自由貿易主義者」還是「系統分析」專家等等）給出什麼樣的建議，對這些當初受騙上當的政府來說，都必將是另一場災難。其結果就是，我們明天將遭遇的經濟災難比今天的更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明智的政府必然詢問這樣一個正確的問題：「爲什麼世界普遍接受的經濟學原則失靈了？」一國政府可能犯下的重大錯誤就是傾聽那些普遍認爲是專家的經濟學家的意見。這種錯誤不能再犯了。

如果幾何原理（公理和公設）正確，那麼與之相符的命題也就正確。我們需要問的問題不是「我們的經濟政策是否正確」，而是「我們的政策是否符合正確的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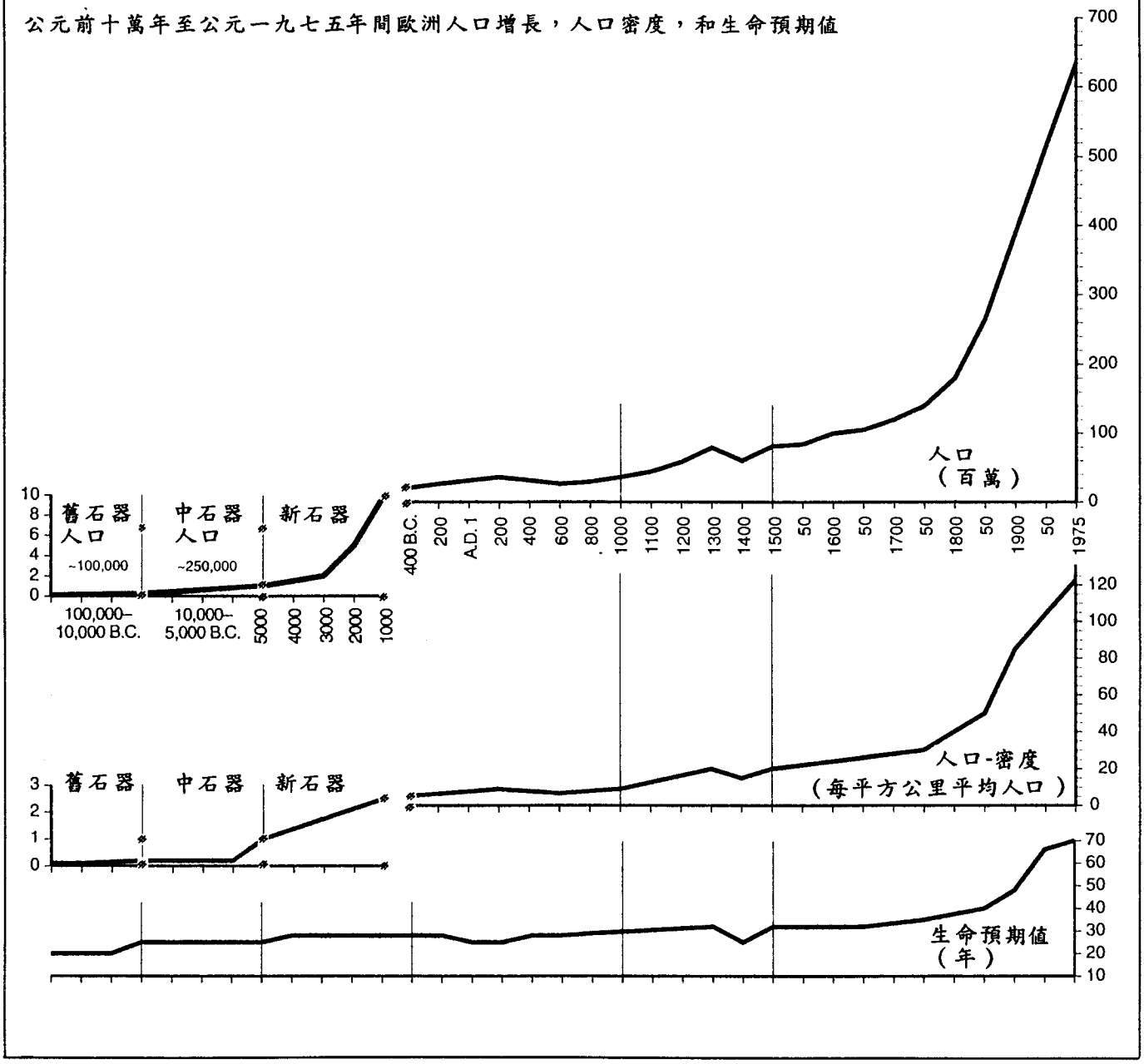
在這里，不要僅僅是索取「經濟規劃」，而是要找到必須把正統經濟學教科書和國際貨幣及中央銀行體系取而代之的科學原則。爲便于表達起見，讓我們設想你爲制定經濟恢復政策提交了一份「規劃」。這里的問題是：你判斷這一「規劃」是正確還是無效的原則是什麼？因此說，在尋求「規劃」之前，先解決原則問題。一旦正確的新原則確立，任何與這些原則相符的政策都將是正確的政策。

一旦采取了正確的原則，政策可以在不違反原則的基礎上做變動調整，但原則不能變，除非科學發現了更好的原則。

幸運的是，只要簡略地回顧一下現代歐洲史中人類變革的情況，就可以輕易地發現我們需要的新原則。

圖一

公元前十萬年至公元一九七五年間歐洲人口增長，人口密度，和生命預期值



所有圖中數據均由各類人口研究報告中選出。本刊所用精度僅供說明，在某個局部人口統計數據可能變化很大。

丁、經過證明的經濟原則

在十五世紀某些治國原則的根本變革發生之前，每個社會、每個文化部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生活在農奴、奴隸或更遭的制度中。本文的附表和附圖提供了證明這一說法的事實證據。這些現代民族－國家原則的變革首先是在十五世紀出現在歐洲，後來延伸到全球的幾乎所有地方，成爲區分現代文明與前人類文明的分水嶺。

在現代社會出現之前的一萬年時間中，在十五世紀歐洲產生之前的全部人類歷史上，脫離相對傳統的農業土地的人口從未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五。（這與今天欠發達國家的情況相同，在這些國家，高達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從事勞動力密集型農業。）在那些享有一定特權但從道理上講也屬于勞動力的百分之五的人中，多數是職員、神職人員、軍人和商人。這部分人通常是屬于

僕人階層，他們的主要作用是協助人數極少的統治階級管理整個社會。在已知的社會中，統治階級一般只是享有最高特權的一些家族組合。這些家族以奧林匹斯山諸神的傲慢，變幻無常地統治整個社會，形成了一群寡頭。

這一古代的野蠻封建模式，通過波斯帝國和馬其頓菲立普國王之間的談判，而成爲【寡頭模式】，它繼承了古代巴比倫的傳統，帶有迦南的蒂爾海洋金融勢力的味道。斯巴達的奴隸社會就屬于這一寡頭模式。

這一寡頭模式從羅馬帝國一直到十五世紀的歐洲都一直在世界上佔統治地位。近五百年來，這一傳統的野蠻封建寡頭改頭換面，成了現代民族－國家和經濟機構中佔統治地位的模式。在近四百年中，這一寡頭中心從十一到十六世紀的威尼斯蒂爾式地中海海洋金融勢力，轉移到二十世紀圍繞英荷皇族旋轉的國際皇家貴族金融勢力，形成新的世界寡頭勢力中心。這一寡頭集團通過近幾百年來連續不斷的戰爭，獲得了對思想、貨幣制度和國際金融的影響力，并且利用這一影響力左右大多數國家的內部事務，從而控制了今天的世界。

不過，盡管有勢力強大的國際寡頭集團的存在，十五世紀歐洲的社會形態還是發生了根本的變革。對這些變革及其結果的研究，是引證這些重要原則的關鍵，因爲這些原則必須決定我們對付現在這場危機的經濟政策。

這些變革主要如下：

丁一、人類的潛在人口密度迅速提高

如果人類就像英國皇室菲立普親王一再強調的那樣只是一種動物，一種高等猿猴，那麼，人類的相對潛在人口密度就應該與高等猿猴相當：人類的數量在新生代的兩百萬年中的任何時候都不應超過幾百萬。我們知道人類在十三世紀就達到了數億。十四世紀中葉以來，人口與人口密度呈雙曲線增長。因此，在最近五百年間，世界人口從三億增長到今天的五十億，如果到八十年代末的技術都能充分利用的話，可以養活二百五十億的人口。

丁二、生活質量也同樣得到提高

衡量發展的關鍵人口指標是活到育齡以上（十四歲以上）的嬰兒和兒童的數量。歐洲十五世紀之後發展起來的新學科改善了衛生和營養條件，是一四四〇年至一九六三年（選擇六三年的原因下面詳述）世界上無論是工業化國家還是其它國家生活水平提高的最主要因素。正是壽命的提高，再加上基礎設施、農業、制造業和其它工業（如建築業）的技術進步，導致了世界各個地方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迅速增加。

丁三、勞動社會分工的變化

爲世界生產必要食物的勞動力所佔的百分比從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二到五。產生這一變化的原因是經濟基礎設施和科學技術的進步。這要求普及義務中學教育，增加大學生人數，增加五到二十五歲的人脫離勞動力隊伍而入校學習的百分比。勞動力中用于發展和維持經濟基礎設施（包括教育、醫療、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的百分比增加了而且還必須繼續增加。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就業率增加了，而且還必須繼續增加。勞動力人平和地平用電密度增加，而且必須增加。年平、人平、戶平和地平用水量增加了，而且必須增加。實物總量，教育、醫療、科學、技術的總量，即人平和戶平的市場消費籃里的實物量增加了，而且必須增加。

丁四、實物經濟的衡量

丁四一、上述指標是按家庭人口消費的單位數來衡量的。如水、電的單位量，噸－英里－小時的運輸能力，均是按人平、戶平和地平來衡量的。家庭市場籃也是按這些人口指標來衡量的。

丁四二、這些衡量勢將導致一個總體衡量：必然上升的維持整個社會的可變成本〔按消費品種類和數量衡量〕與該社會產出的這些必要消費品總量的比較。這表示出社會的再生產循環。我們有兩個主要的名詞。一個是社會成本，即按人平、戶平和地平衡量的在某一生產力水平上維持勞動力和生產能力所需的標準市場籃。另一個是該社會的產出，以同樣的指標衡量。一個社會的產出必須高于投入，否則就會走向崩潰。把投入示作「系統能」，那麼產出高于投入的部分就是相對「自由能」。這樣衡量的結果就是「自由能」與「系統能」之比的變化率。

我們上文談到的這後一種衡量方法，是討論經濟原則所必需的「基本衡量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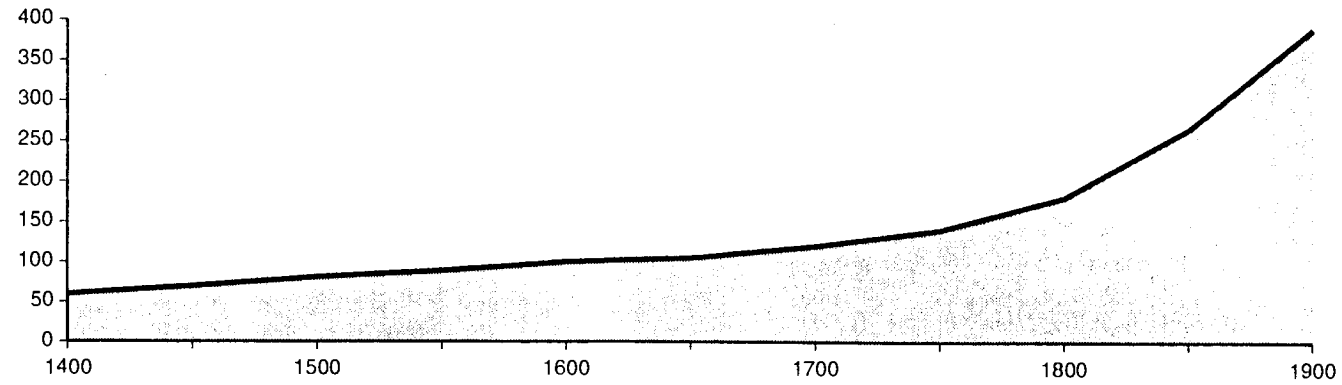
丁五、經濟過程中的非熵

一般說來，一種動物的相對潛在數量密度（不是指其絕對數）是固定的。把人類人口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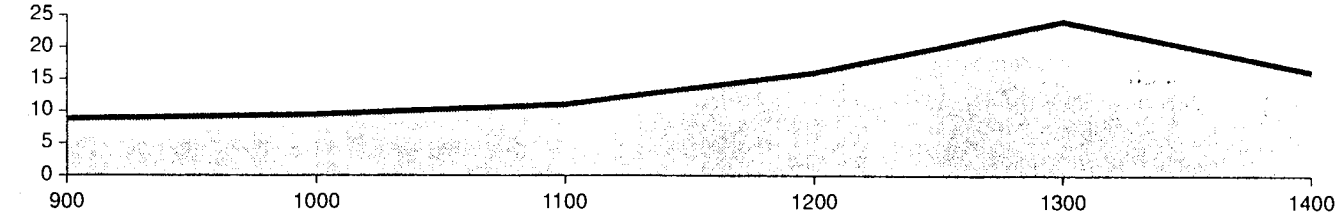
圖二

文藝復興前後的文明比較：連續增長和周期性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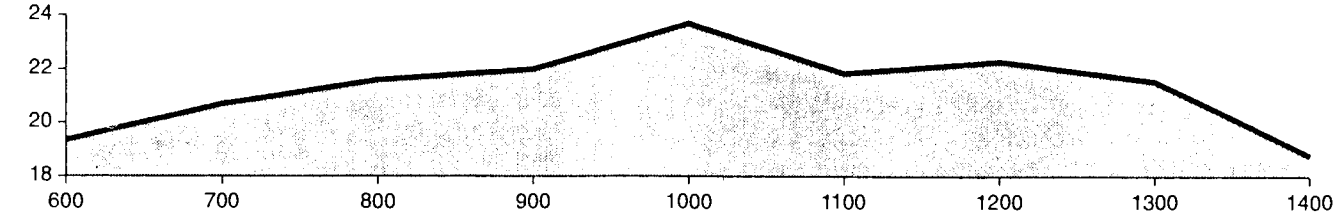
現代歐洲
公元1400-1900
（百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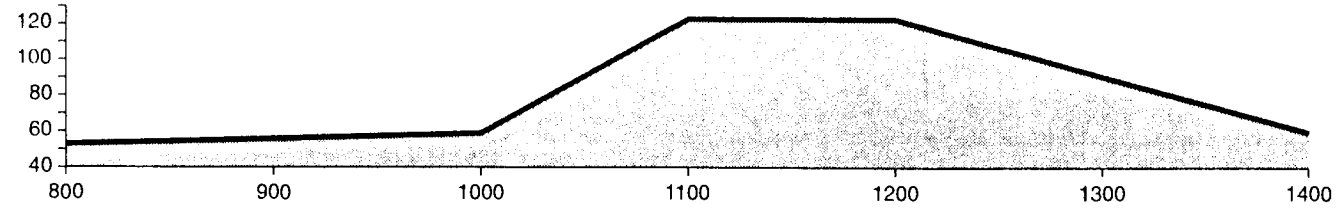
查里曼的歐洲
公元900-1400
（百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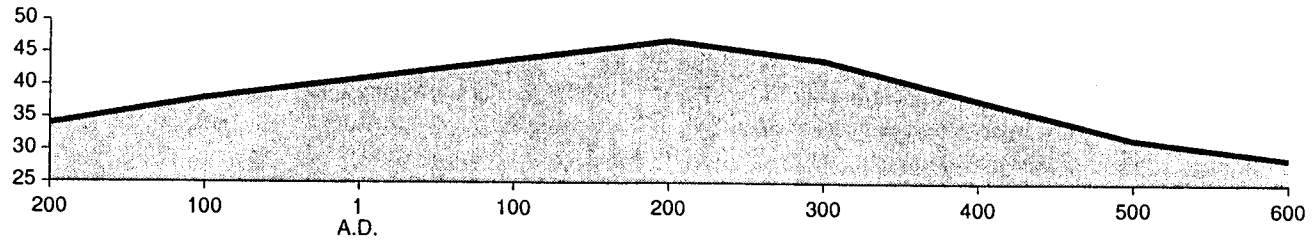
加里菲特（不含西班牙）
公元600-1400
（百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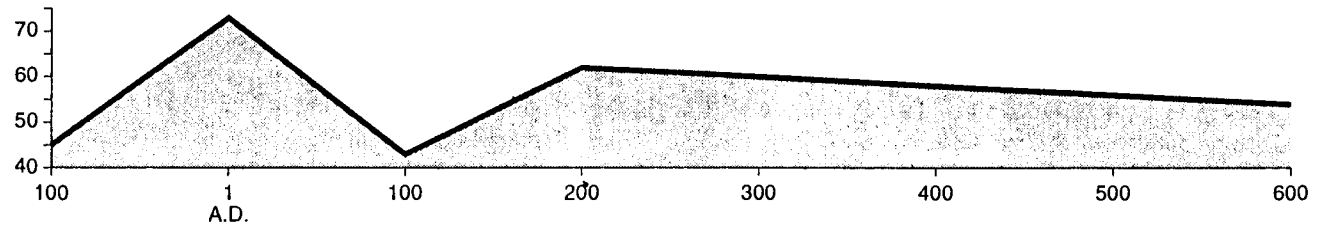
中國：唐宋元各代
公元600-1400
（百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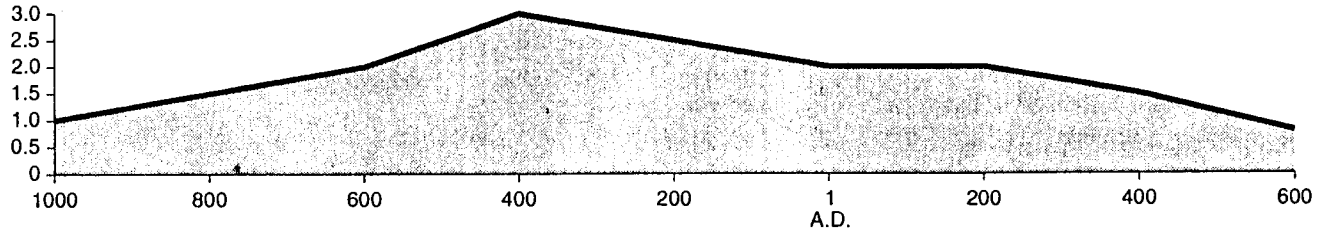
羅馬的世界
元前200-公元600
（百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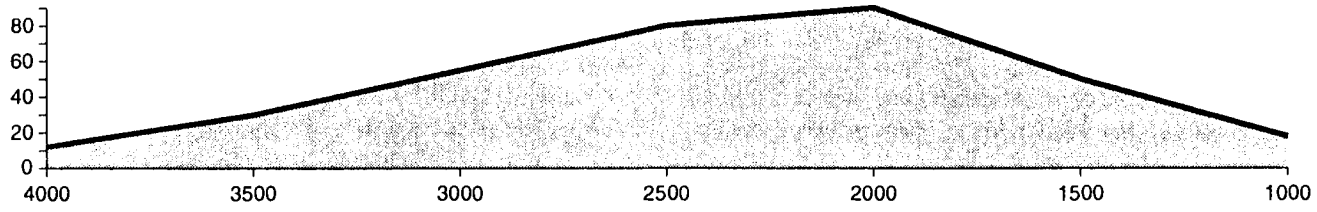
中國：漢至隋各代
元前100-公元600
（百萬）



古希臘
元前1000-公元600
（百萬）



美索不達米亞：巴格達地區
元前4000-1000
（千人）



不同文明中人口興衰的周期與科技發展的關系。注意圖中座標比例變換。

史的特征與高等猿猴數量數據相比較，可以大致但是足以清楚地表示出這一點（見附表）。通過考古結果和其它研究得出的人口發展史揭示出這樣一點：隨著動物等級的升高，其相對數量密度也升高。

讓我們不從「遺傳學」而是從「公理」上，即由公理和公設定義的幾何學的形式命題－格柵來探討這一問題。正如我在好幾個發表物上談過的那樣，我們可以證明，人類潛在人口密度的增加與假設的變化有關，從形式命題－格柵來看，這假設的變化就是公理的變化。

這一史前和有史記載的人類潛在人口密度的變化，不僅僅是物質世界不斷的基本科學發現的累積結果，而且也是物質科學上公理革新、原有成立的公理不斷爲新公理所取代的累積結果，也是經典藝術不斷發展的累積結果。

人類通過技術革命，主要是通過生產和組織生產能力的提高帶來了相對潛在人口密度的增加，這代表按（勞動力）人平、戶平和地平衡量的人類戰勝自然的力量不斷提高。

這一最初發現正確原則和後來發現更新公理的能力并不是社會的創造，而是社會中每一個體的創造。每一發現完全是個人獨導的精神活動的結果；一旦發現成立，便可以傳播給他人，但傳播的唯一途徑是讓聽者重復最初發現者的經驗。

這樣，一個社會的相對潛在人口密度就取決于該社會的社會關系總和的質量。也就是說，如何培養每一個體創造和再創造這種個體精神活動從而帶來更新公理的革命性發現，將決定該社會相對潛在人口密度是否能得到提高。這也是現有物種中惟有人類才具有的一種質量，一種個體之間的社會關系形態。

總而言之，上文所述才是確切找到了眞正的利潤率，即以實物經濟指標衡量的利潤率。整個社會（或經濟）的利潤率談的是同一事情。首先指的是人平【自由能與系統能之比】。爲了集中談談這個問題，讓我們認眞觀察一下這一可變的總體比例與相對潛在人口密度變化之間的關系。在這里，這一比例是實物經濟系統的利潤率。因此，它也代表著整個社會（或經濟）的相對「非熵」。

社會的這一「非熵」的來源，是幾百年至幾千年來該社會不斷創造、再創造和模仿劃時代公理發現的累積增長效應。這些發現就是黎曼在他的資格論文中提到的那類發現。這些發現并不僅僅是那些基本屬于相對科學眞理的東西；物理學中的劃時代公理一般是出現精神活動中，這也適用于經典藝術的發現。

從這些考慮出發，我們可以看看作爲現代民族－國家開端的法國在路易十一領導下于十五世紀進行的治國術革命。這一事件再加上公元一四三九至一四四〇年佛羅倫薩主教會議的影響，代表了現代歐洲文明與封建制的分離，是旨在消滅寡頭模式的進程的開端。

這一新型國家的作用是指導并發展公衆教育，興建經濟基礎設施，鼓勵全體民衆以個人和集體形式參與科學技術活動。與先前的人類歷史相比，這無疑是現代歐洲文化力量的大進步。國家指導民衆、激發盡可能多的人的創造性思維潛力，而不是讓多數人的思想停留在維古是舉、維上是問的地步，這就是現代歐洲文明的超級力量。

丁六、貨幣與貸款的國家形態

丁六一、在這里我們已經表明，衡量經濟的所有適當指標都是基于非貨幣的參數：按人平、勞動力人平、戶平和地平計算的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消耗與產出。所有基本衡量應該首先按這些指標進行，而不管價格如何。這是民衆國家一開始就采取的傳統方法。這一方法從十六世紀直到十九世紀初都稱作「財政學」。在美國第一任總統下制定的憲法就是一部「財政學」憲法，它所描述的經濟體系被當時的政府正式稱作爲「美國政治經濟體系」，這一體系後來又爲弗里德里希·李斯特（List）、亨利·凱雷（Carey）和俄國的維特等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闡述過。這一「美國政治經濟體系」與現在正土崩瓦解的亞當斯密及其形形色色走卒的英國「自由貿易」體系恰成鮮明對照。

丁六二、由美國憲法和華盛頓總統（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七年）共同創立的貨幣體系采納了美國歷史上首次成功發行紙幣的一六八九年之前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做法。北美這一半自治英國殖民地的成功發明使用紙幣，政府將紙幣作爲貸款在經濟活動中流通，從而成功地支持了最大限度的貨物交換，充分利用了當時的生產能力。貨幣應該只是作爲貸款（沒有利息但可以轉讓的政府債卷）的一種形式存在，由政府發行，發放給國

內值得貸款的企業。以這樣的方式來發行貨幣并讓它在政府的保障下在國內外商業活動中流通，其發行的速度就可以保證與貨幣發行所刺激起來的生產同步，如果控制得當，就不會出現通貨膨脹。

丁六三、與之相比，從威尼斯私人銀行寡頭演變而來的英國寡頭體系則要求某種形式的「初始貨幣囤積」于私人手中，尋求由私人壟斷國家和世界的貨幣，通過私人寡頭壟斷集團而不是中央銀行來發放貸款。一七八九年成功建立了影響深遠的美國政治經濟體系之後，兩種體系就基本上分別稱作是漢密爾頓等人的「國家銀行」體系和金融寡頭壟斷勢力的「中央銀行」體系。一九一三年建立的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就是一個寡頭中央銀行體系，它的存在是對美國聯邦憲法的明火執杖的直接違反，它的出現也是因爲一九〇一年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WilliamMcKinley）遭到暗殺之後美國國內親英的寡頭勢力篡奪了權力。

丁六四、正是這種蔓延世界的中央銀行體系現在正危機四伏，要麼在破產下接受政府的改組，要麼在近期或中期隨著「反向金融杠桿」的突然「熱核」連鎖反應而徹底解體。

丁七、現代經濟的兩重特點

反寡頭的佛羅倫薩會議召開和路易十一的法國出現之後，威尼斯寡頭們的初始反應就是：首先企圖壓制這一他們不希望出現的革命，後來隨著反威尼斯的坎布雷聯盟（一五〇八至一五一〇年）的出現，又通過威尼斯炮制的新教改革在聯盟成員國之間挑撥離間，最後他們又企圖擠進反改革的陣營。（從一八九八年起，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就在法國、德國和俄國之間挑撥離間，以防止這些歐亞大陸的主要國家聯合起來進行經濟發展，從而損害新威尼斯式英帝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從一五八二年起，威尼斯寡頭集團主要成員的政策發生了急劇的轉變，從那時起，保羅·沙皮（Sarpi）帶頭制定了一個新政策，依靠威尼斯對荷蘭英國皇族的控制，在新教勢力的歐洲北部建立威尼斯的航海金融勢力。

自一五八二年以來，歐洲文明的整個歷史就是路易十一等人的民衆國家傳統與威尼斯寡頭集團反民衆國家傳統之間長期的斗爭史。沙皮等人的不同之處在于沙皮企圖通過從內部控制政府、學術和科學機構來限制新的現代民族國家，而不是單純地依靠殘酷的反動手法來打擊新的政府和科學。威尼斯寡頭強調從內部攻破敵人，這成了這場斗爭中寡頭集團的拿手好戲。

比如，把英國都鐸王朝的倫敦改造成十八世紀建立的英帝國的首都，就是始于沙皮在建立詹姆斯一世政府中發揮的個人作用。而且，通過威尼斯黨引進威廉的統治，爲一七一四年聯合王國的建立提供了前提條件。

在科學上，沙皮在創立經驗主義時培植了大量信徒，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反開普勒的思想家培根、羅伯特·弗魯德（Fludd）和伽里略（Galileo）。十八世紀初，威尼斯的情報總管安東尼奧·康梯（Conti）在法國、英國和德國（當時叫普魯士）活動，其據點就是後來學者們所說的康梯沙龍。康梯沙龍一直活動到一七四九年他死去，其間聚集的人物有皮薩的格蘭蒂（Grandi）、孟德斯鳩、伏爾泰、吉歐凡里·卡薩諾瓦（Casanova）、重農主義者、法國的卡廖斯特羅（Cagliostro）、弗雷得里克大帝的走狗弗朗西斯科·阿爾伽羅逖（Algarotti）、毛佩爾突斯（Maupertuis）、柏林的尤勒（Euler）和倫敦的吉爾馬利亞·奧提斯（Ortes）。

這一康梯沙龍的目的是在歐洲建立一個抵消來布尼茲影響的組織。它的基礎是沙皮的經驗主義思想，任務是掀起是反來布尼茲的「啓蒙運動」。它利用了沙皮的御用工具，如伽里略、法國的倫因·笛斯卡爾和「英國的伽里略」牛頓，因爲他們都是威尼斯炮制的「十八世紀啓蒙運動」中反開普勒、反來布尼茲的代表人物。由康梯沙龍造就的這一「十八世紀啓蒙運動」給世界留下的東西都來自于現代激進經驗主義者和實證主義者，如大衛·休謨、弗朗科斯·奎因、亞當斯密、法國的百科全書派人物、杰爾米·本森（Bentham）、康德、黑格爾、卡爾·塞維格尼（Savigny）、拉普拉斯（LaPlace）和十九世紀法國、瑞士和奧地利實證主義活動家。在英國，在奧提斯的影響下，出現了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本森的社會學和馬爾薩斯的人口學，等等。

從沙皮到歐爾蒂斯去世的一七九〇年，由于威尼斯的影響，英國政治學、哲學、科學、藝術和其它社會科學的每一個主流派都深深帶有威尼斯的政治影響。正是這些威尼斯人物在這之後的兩百年中領導著佔主導地位的經驗主義或實證主

義歷史觀，即所謂「人性」觀和科學方法論，其目的是從思想上控制全部歐洲人的行爲。

實際上，這些來自歐洲各地的威尼斯派人物就像「來自外空的綁架者」一樣，有選擇地佔領一些關鍵人物和沙龍的頭腦，然後通過他們來影響社會中受過教育和其它階層的人士。爲達到這一效果，他們的所作所爲完全就是植入一組設想的公理。這先是經驗主義的公理，後來又成爲激進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的世界觀。無論是誰只要采納了這些公理，就會自覺不自覺地選擇那些符合經驗主義公理的立場作爲自己的信念命題。

從另一角度講，經驗主義中又注入了所謂「免疫因素」，即一種自我保護機制，抵御今後的社會影響。這種內在的自我保護機制武斷地斷言：經驗主義定理的公理（假說）并不存在。牛頓的著名言論正好說明這一點：假說不能改變。經驗主義強調他們的公理并不是人爲隨意造出的公理，而只是感知自顯示原則和個人人性的外現。根據這一點也許有人可以得出結論說，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是惡毒的精神狂想；無論這一觀點正確與否，我們所談的全是事實，即沙皮和康梯沙龍把經驗主義思想引進了英國。

這一威尼斯手段的高明之處在于：任何盲目接受自顯示經驗主義公理的人的行爲都勢必符合寡頭集團的戰略利益。俄國接受這種自由貿易經濟學的激進經驗主義思想，并以此作爲改革政策的基礎，說明這一威尼斯的操縱手段至今還起作用。

英國皇家之所以崛起爲全球帝國勢力，主要是依靠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的戰爭，以及在本世紀兩次歐亞大戰之中和之後成功拉攏腐蝕了美國的親英金融家族。它使倫敦得以將今天的整個世界都納入英國經驗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說的統治之下，納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凡爾塞和約的統治之下。

這樣，過去五百年的現代歐洲文明史就是這兩大對立體系的斗爭史：一方是從民衆國家制度不斷涌現出的新原則，另一方是民衆國家的對立面，它以威尼斯的寡頭傳統爲中心，力圖建立并控制新型民族國家的政治和其它關鍵機構。

現代社會未能擺脫這些寡頭的控制，讓這一在其它方面強大無比成功卓絕的現代社會淪入現在瀕臨崩潰的邊緣，實在是我們的錯誤。正是這一沒有解決的斗爭，給予過去五百年的歐洲文明史一個鮮明的此起彼伏的特征。這樣，這一文明所面臨的滅亡（至少說以它現有的形式）給過去五百五十年這樣一幅圖畫：長期朝氣蓬勃地發展到頂峰，然後又衰落到崩潰的邊緣。

丁八、一九六三至一九九五年的「文化範式轉變」

除了短暫時期以外，美國獨立宣言、獨立戰爭、一七八七至一七八九年采用的聯邦憲法的中心問題都是如何繼承反寡頭的民衆國家傳統的問題；這一傳統的代表是路易十一國王的法國、讓－波丁（Jean Bodin）的「民衆國家六書」、法國里奇留（Richelieu）、馬薩林（Mazarin）和科爾波特（Colbert）的「統制主義」，以及來布尼茲的自然法概念，在這對立面的則是經驗主義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美國的獨立戰爭實際上是反對東印度公司清客亞當斯密在一七七六年<<原富論>>一書中所闡述的政策。美國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在向國會提交的關于「貸款」、「國家銀行」和「制造業」的報告，確定「美國政治經濟體系」爲美國經濟政策的基礎，這得到了一七八九到一九六三年的所有美國愛國者的贊同，其中包括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但遭到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反對）。

此後，在一九六四到一九七〇年期間，出現了一股反對這一美國文化經濟傳統的逆流。倫敦塔威斯托克研究所有時將這一轉變稱爲「文化範式轉變」。這一「文化範式轉變」是導致今天全球貨幣金融經濟體系螺旋式衰落的關鍵原因。英國菲力普親王和荷蘭伯納德親王的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的工作，就是爲了把歷史的時鐘倒退到封建社會，甚至是倒退到更早的野蠻時期。這就是所謂的「搖滾－性－反文化」，福特基金會一九六四年在「三次革命」中這樣說。一九六七年，另一位鼓吹者布熱津斯基稱之爲「電子技術時代」。倫敦時報的威廉·里斯－摩格（William Rees-Mogg）這類法西斯思想家也把這一新時代與托夫勒和美國衆議院議長金格里奇的「第三次浪潮」等同起來。這就是美國在一九六九年末發起的「生態運動」。從其它方面而言，就是劍橋大學的「系統分析」模式。這一般稱爲「後工業化」烏托邦。這是米爾頓·弗里曼（Friedman）教授和現已去世的弗里德里奇·馮·海耶克

阿爾溫・托福勒，麥克喬治・斑迪，和貝特蘭・羅素

（Friedich von Hayek）的蒙特佩樂林學會的政策。

美國和蘇聯在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達成一些協議之後，以倫敦爲中心的國際寡頭相信倫敦可以把戰後核力量均勢納入其控制之下。在這些倫敦思想家和他們的美國同伙看來，如果大戰的威脅仍舊存在，那麼就不再有必要保持實物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的速度。普格沃什的信條成了新形式的英國「均勢」，即一種相互核威懾的地緣政治均勢。

大家明白，這等于是實現了貝特蘭・羅素（Russell）在公開場合（如他一九四六年給<<原子能科學家公報>>所寫的文章）宣傳的戰略目標。在包括麥克喬治・邦迪（Bundy）和與邦迪有關的英國代理人亨利・基辛格的這些人看來，既然爆發實際大戰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了，那麼就應像盧塞爾二十年前預測的那樣，從長遠來說，民族國家制度應該爲聯合國之類的世界政府所取代。

因此，在肯尼迪總統遇刺幾個月之前，出現了新時代鼓吹者的觀點，認爲不再需要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甚至是工業發展也不再受歡迎了。福特基金會共和基金一九六四年發表的「三次革命」報告也反映出這一後工業化的呼聲。附和這一觀點的另一說法是，對現代工業社會的勞動力和家庭來說必不可少的教育質量和公衆生活質量也不再是那麼重要了，甚至也不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了。

大規模的反合理反文化的群衆運動的試管就是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的反戰運動。曾經當過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邦迪是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八年這些著名事件的中心人物。實際上是邦迪確定了美國對越南的軍事承諾。當他把約翰遜總統拖入他所希望的越南戰爭之後，他就立即離開了政府，成了福特基金會的頭頭，在很大程度上參與組織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的美國反戰運動，甚至還資助魏特曼恐怖組織這樣的群體。

策劃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八年反戰運動的這些勢力後來又發起了所謂「生態運動」。「生態運動」的參加者基本上是從七十年代反戰運動的殘兵敗將中拼湊而來。非理性主義的「生態運動」揮舞「後工業化」大棒，倚仗其雄厚的資金來攻擊現代社會的關鍵制度。一九七〇至一九九五年間，他們的所有行動都是基于徹頭徹尾的反科學騙局，其目的是一步步地摧毀工業社會。目前，這些「生態」行動與菲力普親王的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其前身是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一道

，懷藏摧毀世界各國主權的用心，在這些國家的邊境上或邊境內關鍵的國家礦業、森林和水力資源地建立接受國際監督的生態保護區。

通過這些和其它有關的經濟、貨幣、金融政策，國家的主要政治機構墮落到近乎精神失常的地步。更準確地說，這是有系統地把金融增長與眞正的經濟增長分割開來，讓政治機構對國家生活的眞正狀況漠不關心，社會各階層大多數人的呼聲不聞不問。

一九六三年之前，美國和其它多數國家的累積金融儲備的價值是釘在工農業企業和公用事業的利潤上。由于「後工業化」運動的影響，再加上國際貨幣體系對「浮動匯率」的采用，任意解除對金融和其它市場的管制，金融憑證的價值越來越與工農業生產和公用事業的運轉無關。金融增長與實物增長的關系從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一年開始脫鉤，這一趨勢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月之後鮑爾·沃克（Volcker）采取「有控制分解經濟」的聯邦儲備系統政策又進一步加速。

最近，在美國、西歐和俄國，利潤的主要來源是實物經濟萎縮下金融市場的膨脹。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和英國的國家及地方的政治機構也在有系統地脫離現實，就像控制著政界人物和議會各派的金融勢力與實物經濟脫鉤一樣。

這樣，在一九六四到一九九五年間，現有形式的歐洲文明走進了死胡同。七十年代初經互會就已經明顯地受到這一變化的影響。現在，前經互會各國，尤其是俄國，在全球崩潰體系的綜合作用下陷于全面的癱瘓。

丁九、這一教訓的結果

讓合乎憲法的民族共和國在現代民衆國家的形式下逐漸推進普及義務教育。在承諾發展科學技術的情況下，（近年之前的）現代歐洲文明以最快的速度推進了基礎科學技術的發展，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人類戰勝自然的能力。盡管歐洲寡頭勢力帶來了所有這些邪惡，但事實仍是現代歐洲文明對個人總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大大超過先前的所有文化。

當我們把現代歐洲文明的成就與寡頭勢力的邪惡進行比較時，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似乎是：從現在這場全球災難中恢復過來的唯一道路，是振新這一文明中民衆國家的精華，拋棄寡頭政治經濟學的糟粕。

至于什麼樣的社會形態更適合遙遠的將來，現在談論不是現實的。至于那遙遠的將來是怎麼樣，除非我們活到那時，否則無從知曉。但是，如果我們不能防止現在已經困擾我們的這場曠日持久的全球「新黑暗時代」大災難，我們根本就到不了未來。我們必須立足于經過證明的原則，這些原則的生命力幾百年來得到了基本證實。

我們必須承認三國協約做了一件蠢事，開了一個致命的先例。公元一五〇九年，坎布雷爾聯盟擊敗了威尼斯，而且正準備給予威尼斯致命一擊。威尼斯之所以逃脫了一五一〇年的徹底打擊，是因爲它成功地拉攏了聯盟的一些成員來反對威尼斯的主要敵人——法國。在一八九四至一九〇七年期間，在後來成爲愛德華七世的威爾士王子的領導下，英國玩弄法國、德國和俄國（還有其它國家）于股掌之中，讓它們互相懷疑，爲一些微不足道的現實利益爭執不休，忘掉最重要的戰略利益。

如果說從現代歷史中要吸取什麼深刻的教訓，什麼也許可以稱作「最基本的」教訓，那就是歷史上反復出現的一些國家的悲慘命運。這些國家忘掉基本的原則，把原則錯誤地認爲是「太理論化」了，轉而尋求一些看得見的具體現實利益。從三國協約的例子中，從更早時候坎布爾雷聯盟的瓦解中，我們看到：一個國家如果像這樣追求「實際」而忘掉「理論」，那麼它可能將發現它自己就像沙皇尼古拉二世一樣，進入第二次大災難。

從過去五百年現代史應吸取的第一個原則是：上述的寡頭模式是我們的敵人，應該粉碎；我們現在最關鍵最緊迫的眞正利益是振新現代史中的精華，拋棄其中的糟粕。

戊、恢復的戰略

戊一、恢復所需的制度保證

從原則的角度講，俄國的恢復需要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它必須采取與「美國政治經濟體系」賴以建立的原則相一致的國民政治經濟體系。二是它必須在國外有一些勢力強大的朋友和經濟伙伴，從而使這一俄國的政治經濟新選擇能得到廣泛的國際支持。除非在國際和國內大力公開宣揚決定政治經濟制度的這些原則，否則這兩個

前提條件都不可能實現。

戊一一、必須指出，亞當斯密及其當代貨幣主義信徒的意見徹底失敗了，這使俄國有義務采取過去兩百年中得到證實的非帝國主義經濟模式，即美國的「美國政治經濟體系」這種國家統制模式。闡述這一模式的權威人物有美國財政部長漢密爾頓、馬修·凱雷、亨利·凱雷、德國的弗里德里奇·李斯特以及遵循這一傳統的其他人。

戊一二、應該明白，俄國也像前經互會的多數成員國一樣，在全球金融大混亂下壓得揣不過氣來，而這場大混亂正導致地球上各個角落越來越多的國家崩潰。

歷史上吹得最大也最危險的金融投機肥皂泡，再加上讓世界衰退到蠻荒之地的「後工業烏托邦」思想，威脅到俄國每一個家庭和每一個人的生存，是他們身上無法承受的負擔。

近幾年中，這些情況和趨勢以及「震蕩療法」的效應，徹底破壞了俄國和其周邊國家的實物生產和消費，按人平、戶平和地平計算大地實物量還達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四分之一。

證據是清楚的：對俄國來說，對大多數前經互會國家來說，對全世界的多數國家來說，國際市場上近年來的貨幣主義經濟、貨幣和金融政策證明是全球性的失敗，是全球的社會災難。

戊二、經濟的憲法政治結構

俄國需要的不是變成最佳時期美國的翻版。俄國步出現在這場經濟災難的國家政策，應該是采取一種俄國體系，它將包納經過檢驗證明成功的原則，而且這些原則不僅爲美國的經驗所證實，也爲采取同樣原則來振新其經濟的其它國家的經驗所證實。

美國的最佳時期正是美俄政府關系最好的時期，這一點也許并非偶然。美國和俄國再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的良好關系使俄國對美國獨立提供了關鍵的支持，加入「武裝中立聯盟」。解放了俄國農奴的沙皇亞力山大二世是美國總統林肯的盟友，而當時帕梅爾斯頓的英國、拿破侖三世的法國和西班牙正結盟準備從海上入侵美國。爲什麼俄國不應得到一個老朋友對經濟科學的貢獻？

下面所述不應讀作爲企圖爲改革提供一個「藍圖」；它只是表明一些相關的觀點：

戊二一、按美國憲法的條款，「美國政治經濟體系」這種經濟形式的基礎是憲法序言中所說的「總體福祉」條款。就此而言，這可以認作是對來布尼茲自然法原則的確認，是對約翰·洛克經驗主義說教（生命、自由與財產）的否定。美國獨立宣言和聯邦憲法的起草者們認可了來布尼茲而拒絕了洛克。

戊二二、從美國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向國會提交的三份報告的高度可以看到，「美國政治經濟體系」的總基礎就是美國聯邦憲法的第一條。

戊二三、這些報告和憲法條款應該結合有關的歷史事實來看，不僅是美國的歷史，而且也包括外國的經驗，如法國史中的國家主義時期，從路易十一、里奇留、馬薩林、科爾波特到後來的戴高樂總統。這也包括德國在李斯特影響下的崛起和日本的明治維新。它還包括俄國門德列夫和維特的類似政策，以及維特的重要盟友、法國外長漢諾托克斯的歐亞基礎設施政策。

戊二四、美國體系在世界各國的成功應用毫不含糊地表示出憲法認可的政治經濟形式；在它之下才有了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之分的總體國民經濟。可以運用的實物經濟原則是：整個國家各個部門的有效發展不能依靠于各自爲政的基礎設施建設總和及國家領土內小塊地盤的私人業主的個體行動。這就是：

（A）聯邦政府對國家貨幣的產生、發行和管制實行壟斷，并且對國家和私人銀行業務和貸款實施管制。用于發行新生貨幣（不管是現鈔還是聯邦債卷）的最佳機制，是在管制下由國家銀行出貸，它也是國家貨幣發行的儲備機構。

（B）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既共有也分擔創建、改善和維持聯邦、州和地方的基本經濟和政治基礎設施的責任。由于聯邦政府負責州際商務活動的憲法條款，聯邦政府自動負有這方面的責任。沒有規定聯邦政府負有的責任則是州政府的責任。這主要包括：軍事警察力量、司法、水的管理、衛生、交通、發電輸電、通訊、教育、醫療保障和促進科技進步。

（C）就實物經濟的基礎設施而言，政府既可以自己興建和管理基礎設施，也可以把這一作用交給由政府調控的全私人或半私人公司。政府決不能放棄它協調發展國家、州和地方正當事業的權力。

（D）其它領域，如農業、礦業、工業、商業銀行、商業和贏利性服務業，從原則上講應屬于

國民經濟的私人部門。政府不是不能擁有這些行業，而是應該回避這些行業，如果私人公司可以滿足國家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的話。

戊三、爲經濟提供方向的方法

同樣，下面所述也不應讀作爲企圖爲改革提供一個「藍圖」；它只是表明一些相關的觀點：

戊三一、國民經濟增長和「自由貿易」是水火不相容的兩種東西。縱觀一九六三至一九九五年「文化範式轉變」之前的整個現代歷史，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是經濟成功的標志，而「自由貿易」則是大英帝國強令其受害者接受的政策。如果世界各國政府接受「自由貿易」，則整個世界的經濟將墮入全面崩潰之中。

反「自由貿易」的經濟保護措施之所以必要，是因爲如果產品的價格不高于其必要的生產成本，生產這一產品的工業就不能生存下去。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允許無力購買的外國商品在本國傾銷，那麼該國的經濟就不能發展。使用關稅和貿易管制等保護主義措施的主要目的，不是增加稅收或開闢它種稅收來源，而是每一個精神正常的現代國家發揮的經濟計劃作用。

經濟保護主義的主要受益者是國家的每一個家庭。這一論點實際上完全等同于亨利·凱雷及其他人在美國奴隸制問題上的觀點。

如果它國以低于我國的價格向我們出口商品，而且它之所以作到這一點是因爲廉價勞力和低基礎設施成本，那麼在這一交換下兩敗俱傷。出口國仍保持落後，生產部門的勞動力仍然生活水平低下，而我們勞動力的生活水平也要降低到接近國外廉價勞力的悲慘水平上。因此說，「自由貿易」直接違反了美國聯邦憲法序言中的「總體福祉」條款。

所以，美國政府以前采取的保護主義關稅和貿易政策是合法的，不可缺少的，是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中政府的有力工具。沒有這樣的手段，政府不能有效地保護本國的貨幣幣值。

戊三二、就國民經濟的內部發展而言，政府在國民經濟的四個方面可以發揮長期而有力的作用，刺激整個國家的生產和生產率向更高水平發展：（1）（實物）經濟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改善；（2）促進先進科技研究的發展；（3）協調發展公衆教育；（4）政府利用其購買力、投資減稅權力、優惠貸款權力等促進先進技術的發展和運用。這些措施可以最快地提高按人平和地平衡量的經濟生產力。

采取這一方法有兩個問題需要注意。當貸款給大規模基礎設施項目時，或給資本密集型項目時，或給科技發展項目時，或給上述的某種綜合項目時，帶來的最大效益將轉到整個經濟上。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其主要的受款人發放的貸款將帶來最大的乘數效應，向上促進生產商的定貨，向下改善整個經濟的技術水平。

與此相比較，如果把同等數量的貸款發放給通常的消費品生產商，則不可能對整個經濟產生如此之大的效應。只有一種情況除外，那就是貸款解決了某種瓶頸問題，即一種必須解決的重大短缺問題。

戊三三、如果國家禁止用中央銀行來取代政府對貨幣制造和發行的獨家權力，那麼國家銀行就可以使國家具有強有力的行政手段來刺激無通貨膨脹的眞正經濟發展。

通過國家銀行體系來出借國家貨幣的機制，可以使國家不用靠公開市場上發行債卷來籌集貸款資金。國家貨幣可以通過貸款出借在市場上流通，但貸款利率的確定只考慮綜合風險和管理成本。這樣，國家貸款就是市場上最便宜的貸款。通過這種定向的國家貸款，政府可以直接調節公共部門的增長，也可以向經濟中的私人部門提供投資機會。這種貸款的發放方法類似于建房貸款單獨審批方法，而且它主要是貸給實物經濟部門和科技部門。這樣作的結果不僅不會有通貨膨脹，而且還有可能促使貨幣升值，因爲隨著先進技術的采用，導致生產率的大提高，從而降低產品的成本。

戊四、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特殊作用

實物經濟中最關鍵的三大瓶頸是：按人平、戶平和地平衡量的水資源（立方米／小時）、電（千瓦小時）和運輸能力（噸公里小時）。這些瓶頸問題對潛在人口密度有著明顯的影響。這就是說，如果技術水平相當，地方大小和一般情況相當，地區之間在生產力發展上的差異就取決于克服這三大基礎設施瓶頸問題的程度。

戊四一、因此，我們必須談「發展走廊」問題。所謂發展走廊指的是一條鐵路線，或內河航運線，或兩者兼而有之，它們是走廊的「脊椎」。這一模式可見于沿著萊茵河的鐵路線和工農

業發展。廣泛應用這一「發展走廊」原則的實例可追朔到查理曼發起的西歐內河航道發展。

戊四二、一般說來，這一走廊的寬度今天可以達到「脊椎」兩邊各五十公里。在「脊柱」即走廊的中心，是管道、輸電線和與之平行的公路干線。在這一脊椎線上，有不少發展集中區，供給線就像從脊椎伸出的肋骨一樣，伸向這一「脊椎」兩邊的腹地。

戊四三、如果俄國經濟發展選用這種現代「發展走廊」網的模式，那麼有兩個關鍵因素需要考慮。第一，倘若不大規模開發俄國豐富的但卻利用不充分的水利資源，不發展有效率的歐亞鐵路走廊，那麼要充分開發俄國人煙稀少的大片地區則是步可能的。第二，沒有從柏林通過波蘭進入俄國和烏克蘭的內河航道和鐵路，西歐和歐亞大陸之間的通商往來就不會具有經濟效益；而達不到這一點，俄國的經濟發展相對說來就不會是完整的。

比如說介于現已被污染的里海和被破壞的咸海之間的中亞地區。這些湖的水位和臨近地區的水位必須提高。只是把現今流入阿拉伯海的部分水截流，便可以倒灌進這些湖泊，同時也可以供水給開發擴大後的內河航道網，滿足經濟其它部門和家庭的需求。

歐亞「大陸橋」和其它發展走廊所要解決的關鍵性一般問題是：低人口密度勢必大大增加生產成本。成本增加的原因是必須向運輸「管線」提供的庫存量要增加，每噸貨物運輸的成本也就增加。

解決這一問題有集中方法，而這些方法總的說來均屬于發展走廊的概念。

（A）發展走廊戰略可促進興建高密度的生產集中區，擁有高效率的運輸、供水、供電荷通訊設施。采用這一方法，在一大片低人口密度地區可以發展爲高效率的高密度地區。

（B）「脊椎」主線可提供運輸通訊干線和主要的電水生產供給設施。

（C）發展高速磁懸浮技術和大批量生產發電能力在一至二兆瓦的高溫反應堆，可將俄國沒有開發的廣闊地區發展成具有巨大潛能的發展走廊網。世界上基本上沒有任何其它國家比前蘇聯更需要利用磁懸浮技術。考慮到運輸化石燃料去發電的成本，考慮到高溫反應堆遠遠超過火電廠的能通密度，考慮到大量使用電力而帶來的效益，批量興建高溫反應堆可爲發展走廊帶來巨大潛能，而這是俄國經濟向深度發展所必不可少的。

我們在這里所說的走廊的作用是把看起來也許是俄國的短處轉化爲長處。

戊五、空間計劃的基本經濟作用

自稱「重實際之人」的思維有一個共同的錯誤，那就是所有動物，也許除了少數動物如愚蠢的熊貓之類，遠比最「實際」的人還要實際得多。地球上最實際的人是在傳統農業方式下有時甚至是非人條件下工作的農奴。如果他的方式不變，他的生活水平將永遠不會改變，甚至是幾千年中也不會改變。動物不像古代雅典學院的埃拉托色尼，它們永遠不會脫離實際，不會懷疑地球是個球體，不會去測量地球直徑的極地誤差在五十英里之內。同樣，那些實物經濟學尚未入門的人總是認爲，政府大規模空間計劃要麼是純軍事目的，要麼是爲了提高政治形象，否則就是浪費金錢。

如果一個有效的經濟恢復計劃在俄國實施起來，繼續并擴展俄國的空間計劃最能促進人平、戶平和地平的俄國淨產出的提高。在這里可以簡單談談這一觀點：馬克思、亞當斯密和大衛·李佳圖（Ricardo）從不明白現代經濟創造的實物經濟利潤的源泉。指導得當的空間計劃就是這種源泉。從美國大量投資生產所謂高技術軍事武器等浪費中，美國不斷地獲得某些巨大的經濟進步。

戊五一、經濟現象

美國在耗資龐大的大戰（包括南北戰爭）之後，總比大戰之前要興盛得多，這已是美國的一個有利之處。美國的工會和其他人總是對這一現象迷惑不解：龐大的戰爭開支總是使美國更加興旺，而和平時期的裁軍卻總是伴有衰退甚至蕭條。

對這一悖論的解釋應該釋顯而易見的。實物經濟利潤的唯一來源，是完全由科技進步而引起的勞動力生產能力的提高。這是推崇封建制度的重農主義者所拒絕接受的，如像亞當斯密和里卡多之類的英國經驗主義者和馬克思之流，後者在<<資本論>>中明確貶低技術進步的作用。

美國經濟也同樣受益于肯尼迪總統載人飛船登月的「緊急計劃」。六十年代航天計劃所花費

的每一分錢，爲美國經濟帶來了回收十分錢的好處。

戊五二、好處是如何轉移的

科技發現轉化爲人平和地平生產力的提高是通過所謂「工作母機」的工業部門實現的。一般說來，一個建來驗證原理的優秀實驗室本身就是新母機原理的模型。這一母機原理反過來又溶于母機設計之中，成爲勞動力生產力提高的媒介。投資于先進技術的軍事計劃也和空間計劃一樣，對經濟發展有著間接但是巨大的益處。軍事和空間計劃的這種轉化效應是通過刺激母機部門來實現的。正是在此刺激下產生的新母機設計帶來了生產力的提高。

戊五三、太空計劃必須重新定義

從一個經濟學家的角度講，空間計劃有雙重性質。從科學和工程角度講，空間計劃完全是反常的。把物體和人送入空間進行探索已經就是反常的了；這需要人類永遠不斷地對付從未遇見過的問題。空間探索的主要目的是發現我們宇宙中的反常現象，研究現有知識無法解決的物理現象。

黎曼在他一八五四年資格論文中，對形式數學里通常存在的謬論進行了批駁。他的觀點正好說明與空間計劃有關的政策考慮。數理學的進步取決于總體實驗中的某些實驗所取得的獨特意義。講英語的現代物理學家似乎喜歡用「關鍵」而不是用「獨特」一詞。

爲了盡可能簡結明了地闡述這一關鍵問題，讓我按我喜歡的語言來重述一下黎曼的觀點。這可以直接引出空間計劃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獨特作用。

科學在它的嬰兒時期，或多或少不可避免會犯下錯誤，企圖把物理學簡化爲某種形式幾何，某種具有零曲率的公理。這是幾何，不是眼光，而是視覺想象的天眞集合。在這里，時間和空間以一種完美的形式無限期地持續下去：向上向下，向前向後，向左向右。攝入我們感官和想象的物質與事件也是在零曲率的時空中。這樣，我們就犯下了一個天眞的錯誤，假定自然過程可以按數學方法來重復，而且是重復在視覺想象的零曲率時空之內。因此說，這種天眞的錯誤落入了伽里略、弗魯德和牛頓等人的「物質時空」的陰謀之中。

如果我們從形式主義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獨特實驗研究將得出這樣的結果。我們發現，在所有這些事件中，物理學給我們的命題不能符合于天眞時空數學的公理和公設。按形式主義的觀點，我們只能通過新「假設」才可以承認自然中的反常現象。按柏拉圖或黎曼的「假設」定義，要用新的公理和公設來取代天眞數理學。

這樣，我們就不再有一個簡單的零曲率時空。由一連串獨特實驗所帶來的所有公理和公設的變化，就將導致某種確定的非零曲率的物質時空概念。在這一轉化中，天眞的新亞里斯多德機械因果論，如沙皮－伽里略提出的概念，必將爲開普勒采用的普遍理性概念所取代。

這就是科學進步的基本秩序，也是技術進步的秩序。

由于黎曼所認識到的原因，更直接研究這類曲率的實驗及其觀察在我們的感官範圍之外，在天體物理學和微觀物理學研究的盡頭處。這不應使我們感到吃驚，因爲正如柏拉圖學院所揭示的那樣，朝向數理學邁出的第一步就是通過天文演釋研究而取得的。對生命和非生命過程的本質區別的研究，完全相應于先驅研究，從這些研究中，將出現大量最初的、合理的、基本的發現。

最遙遠最小的生命的微觀物理形態是什麼，人類又是如何在浩翰的天體物理領域生存的，這些就是探索科學前沿的表示。

因此簡單地說，科學進步的前沿是由人表示的，即人的最貼進的微觀世界作用于浩翰天體物理中所發現的最反常的現象。宇宙射線，所謂「黑洞」視覺測量的光譜分析，迅速旋轉的雙子星的旋轉分離，恆星宇宙的光譜學等等。在這里，人類將發現獨特的反常，從而提高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的能力。在這里，將發現爲地球上的經濟帶來最大益處的線索。成功地探索這些線索，只能靠成功地擴張大型空間計劃。

戊六、戰爭動員的類比

要把一個像俄國今天這樣的破碎經濟重新組織起來，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采用戰時經濟的方法。這方面現代世界有很多例子。

關鍵問題是：經濟恢復的初始階段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由政府把半閑置和全閑置的資源調動起來，通過命令把基本材料、機器、勞力等集中起來，從而將生產規模恢復到先前某個時候即

經濟崩潰之前的水平。

在初始階段過去之後，政府的調動能力轉變到下定單和發放貸款以償付工資和材料費。經濟恢復初始階段進行調動的一個好方法，很類似于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戰前和戰時美國經濟動員的初始階段，即把軍事和民用的後勤力量調動起來爲戰爭服務。

戊六一、可資比較的一些有用模式

近幾十年來，我一直建議研究法國進行經濟動員的辦法。法國的做法由「成功之父」拉扎爾·加諾特（Carnot）開創，經過加諾特和蒙吉－勒金德雷（Monge-Legendre）一七九四至一八一四年在巴黎理工學院的共同努力而進一步完善。這些方法通過凱摩特和蒙吉的同道，進入一八一四年之後在塞萬納斯·沙耶（Thayer）領導下的美國西點軍校。在此期間，一八一二至一八一三年德國和德俄聯合在席勒朋友們的指導下成功地完成了針對拿破侖入侵的動員，這些動員也取得了同樣的效果。凱摩特／巴黎理工學院的模式第一次把軍事動員建立在科學技術基礎之上，成了一個經典範例。

其它範例還包括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和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美國的戰爭動員，以及軍事和準軍事的科技動員，如曼哈頓計劃和六十年代的的阿波羅計劃。同時也包括爲希特勒之前的席雷徹（Schleicher）政府設計的德國經濟恢復計劃，但席雷徹政府被力圖扶植希特勒上台的英美勢力所顛覆。另外還有「法國重工業」改革，以及戴高樂總統在第五共和期間推行的工業和核武器發展計劃。

戊五二、動員是否必將導致專制獨裁？

這些動員的範例會帶來具有特殊意義的社會影響，那就是人們會擔心如此規模的經濟動員也許甚至可能導致新專制獨裁的出現，產生這樣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本報告後面附有前人對這一問題的觀點。

已、現代歐洲史上的「國家黨」

門德列夫和維特在發展一九〇五年前俄國的鐵路和工業上發揮的顯著作用，告訴我們具有現代民族－國家形態特征的現象；這是自十四世紀中葉倫巴第債務危機導致的破產之後大約六個世紀以來的現代民族－國家形態。我把這一現象稱作「國家黨」，因爲這一名詞有時出現在歷史上，指某種正式的政治運動，同時又是某種社會現象，如門德列夫和維特之間的合作。

我們可以恰當地說，在一八一二年以前的歐洲舞台上，德國是一個詩人和思想家的國家。但是，實際上也正是每個國家的詩人和思想家開創了民族－國家的現代合衆形式。除了某些極少數例外（如法國的路易十四），保持歐洲民族文化的優雅語言和其它特征延續下來的不是國王和寡頭勢力，而是詩人和思想家。

但丁是現代合衆國形態的奠基人之一，在他之後是彼得拉克。文藝復興和路易十一的法蘭西合衆國的產生，是因爲有了古典人文主義的思想，「共生兄弟會」。佛羅倫薩會議的組織者是庫沙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usa）和後來的皮尤斯第二（Pius II）。在奧拉托利會的成員鹿特丹的伊拉斯模（Erasmus）和拉非羅·桑日歐（Sanzio）的幫助下，新合衆制度得到傳播。反對威尼斯寡頭佔領倫敦的運動就是由劇作家克里斯多福·馬拉維（Marlowe）和作曲家約翰·布爾（Bull）等人領導的。

在法國，反對寡頭勢力的代表人物有：奧拉托利會的伊拉斯模同道弗郎科斯·拉貝勒，教會人員里奇留和馬薩林，一般平民科爾波特，反經驗主義科學家德薩爾格（Desargues）、菲爾馬特（Fermat）和帕斯卡。

在現代德國，這些代表人物是：來布尼茲、巴赫、列辛、門德爾松和席勒圈子里的人，如他一段時間的合作者（如歌德），他的朋友（如洪堡和沃爾佐根），以及他的追隨者（如貝多芬和舒伯特）。後來，有偉大的高斯、勒究茵·迪里席勒特（Dirichlet）、韋伯和黎曼。再後來，是反對寡頭實證主義糟粕的最後一個領袖：普朗克。

國家的歷史不是國王、王子和貴族的歷史，對他們來說，國家是一塊封地；歷史也不是上層金融寡頭的歷史，對他們來說，國家是掠奪的對象。國家文化的延續是這部分知識分子獨特的作用，他們承認這樣的原則：知識可以通過個人智慧的創造性才能而產生出來。正是這部分知識分子，他們認爲人不是動物，惡棍，而是上帝的肖像具有創造性的智者。我把這部分人視作爲一個國家的「國家黨」的社會基礎。

這部分知識分子，不管他們說哪國語言，都是所在國家文化延續的使者。當這部分知識分子響應本國的需求時，他們就成了「國家黨」的天然領袖。正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寫下了美國聯邦憲法的序言；正是奴隸主、獨裁者以及實際或將做封建貴族的人寫下了經驗主義的美國邦聯憲法序言。

門德列夫、維特和後來的維爾馬德斯基（Vernadsky）與一八七一至一八九八年拿破侖三世法國之後實際的「國家黨」的關系，一七九四至一八一四年凱摩特－蒙吉－勒金德雷的巴黎理工學院的這一傳統，都值得我們研究。我們這些在各自國家中都是「國家黨」天然代表的人應該更清楚而深入地認識到：我們之間的天然合作的歷史基礎，是我們需要共同保衛我們國家反對敵對的寡頭黨的掠奪。

通過緊急動員來發起經濟恢復運動是將導致自由還是獨裁，取決于指導這場動員的機構的社會組成。如果這一指導機構全部或部分像寡頭黨那樣思維，那麼它勢必將它的力量集中起來形成一種獨裁視力，或類似獨裁的視力。如果國家黨當政，情況就完全不同。這兩種領導模式之間的關鍵區別，是把普通百姓看成是服從命令的牛，還是具有創造性智慧的個人，即擁有偉大道德力量能夠喚醒人們起來行動的人。

由于這一原因，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不相信那些握有權力忙于事務的重實際政治家。我們所相信的人必須懂得理論指導實踐的重要性，而不是把理論看做是空洞的言詞，其目的只不過是爲了證實實踐。我認爲政黨有一定價值，但是我并不怎麼喜歡它們。我喜歡政治運動，因爲它們是由熱情所驅使，是爲了實現推崇科學進步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合衆原則。

迄至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止，爲洗清林頓・拉魯旭（Lyndon H. LaRouche）莫須有的罪名，全世界共有逾千位公民聯名上書美國總統克林頓。聯名呈請簽署人中包括牧師，軍方和司法官員。由於本刊篇幅所限，以下僅列示各國已經公選出的代表及官員。聯名呈詞在美國曾見于『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今年四月二十七日的維吉尼亞州府的『里治蒙時報快訊』：

美國：	24位前國會議員，360位州議員
拉丁美洲（共9國）：	2位前總統，9位前部長，和67位立法委員
歐洲（共13國）：	1位前部長，52位立法委員
俄國，烏克蘭及亞美尼亞：	39位立法委員
中東（共4國）：	11位立法委員
非洲（共6國）：	1位前部長，23位立法委員
亞洲（共7國）：	1位前部長，44位立法委員 （其中包括30位中華民國立法委員）